

序一

刘宏

鲁虎博士的专著《新马华人的中国观之研究1949-1965》出版，我由衷为他感到高兴。

鲁虎是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2003年1月开始指导的研究生。他之前在北京大学接受本科、硕士的历史学训练，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东南亚研究，已有较好的专业功底。他放弃稳定的工作职位来国大攻读博士学位，学习目标明确，仍以他喜爱的东南亚历史作为主修方向。鲁虎以求知为乐，勤学好问，积极修课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。他还特别珍惜现场感受新马历史的机会，常利用周末或假期时间背包外出访古寻幽。

鲁虎的新著来自于他的博士论文研究。他经过一年的学习准备，确定把新马的中国观作为研究论题。这是新马历史研究有所涉及、但尚未系统、充分探讨的领域。在交流和互动中，与资金、物资、人口等相比，信息、观念、思想同为客观事实，但具有无形的特点，因而在分析时相对更难把握。选题不仅要考察新马巨变时段的方方面面，而且也需要对中国的历史有相应的了解。在这点上，鲁虎可谓勇于应对挑战。观念/形象研究，一般可从文化形象学的理论进行，或按照国际关系研究对社会心理学的借鉴着手。鲁虎的研究以他熟悉的历史学因果探讨为基础，参照国际关系相关理论，结合区域研究、东南亚中国关系、华侨华人、民族主义等已有学术成果，所提出的研究框架和思路都颇为自然合理。他在研究资料上肯下扎实的功夫，广泛阅读、搜集中文、英文及部分马来文的文献，从报刊新闻、档案资料、研究著论、个人访谈到广告文字都博取采用，同时本着有一分史料说

一分话的原则，参证辩驳，条陈节论。在鲁虎的研究中，既有宏观的背景、类型、影响概论，也可见细致的个案、人物、事件解剖，论述和文字都显示出其求真存疑的严谨态度。在对新马社会三类中国观的全面、深入论析之后，鲁虎提出中国在战后新马内部发挥着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大影响，并且是新马历史外部动因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。这一结论是谨慎求证的结果，颇见说服力。

去年下半年，鲁虎对他的研究做了两次补充修改。在更新的论著里，他把论题调整为新马华人的中国观。这一调整使整个研究更为集中，各论述部分也更加平衡。为此，他对某些章节也作了新的安排。鲁虎补充了大量的最新出版资料，系统查阅一些旧报章，充实了研究论述，尤其是在中国观的建构和内容方面，如英国最高殖民官员麦唐纳的中国观和韩素音1956年访华即为新增部分，有助于更清晰展现当时的历史图景。修改后的文字表述也更为中性，原来通篇较多的用词如“新中国”和“英国殖民当局”等，需要处都注意作了相应的更换。

多年辛勤的研究，终能出版面世，这是一件值得欣喜、祝贺的好事。古人云：“学不可以已”。我期望鲁虎博士能够坚持不懈，更上层楼，为东南亚尤其是新马研究做出更多、更好的成绩。

南洋理工大学陈嘉庚讲座教授

2014年3月